

调整生产结构 提高经济效益

董绍华

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的八字方针，调整是关键，是中心。在组织工业生产上，我们要认真全面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。从当前工业生产的现状来看，抓好下面几项工作，对工业生产的调整是有重要作用的。

首先，要调整工业内部不合理的产业结构。我国的经济工作者和理论界，经过一年多来的讨论，比较一致地认为，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，这样一种生产水平的条件下，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，即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，以保持在25%左右为好。但是“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”。（《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》政治经济学部分第16页）。如果我们想把积累率由目前的30%多，调减到25%左右，那就意味着基本建设的规模要有较大的压缩；而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生产的规模，也必须调减下来。如果生产规模还保持原来那么大，就会发生产品生产出来销不出去，造成积压。而积压下来的产品，要继续以流动资产计入积累，结果积累率还是降不下来。因而调整国民经济的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，必须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的同时，采取“釜底抽薪”的办法，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，调减生产资料的生产规模。

经过一年多来的调整工作，我国工业生产中的轻重工业的比重，已经开始发生了可喜的变化。1980年的头11个月，重工业生产的比重，已由1979年的56.9%，降为53.5%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，上面所说的重工业产值比重的减少，是在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活干或者任

务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的，而对这些企业和生产能力，还没有实行关停或转产轻工业产品，就是说重工业的实际生产规模还没有真正减下来，实际的重型生产结构还没有根本改变，因而我们的调整任务还是很重的。

这一次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，远比六十年代那一次调整要复杂的多。那一次搞高积累，连续的时间毕竟只有三年，到1961年就开始调减下来了。而且当时压缩工业生产、实行关停并转的企业，多半是“大跃进”时土法上马的工厂，上马时间短，生产基本上未定型，因而相对地来说，也比较容易减下来。就是这样，当时调整这三年高积累我们还用了五年的时间，直到1965年，重工业生产的比重才由1960年的66.6%调整为48.4%，积累率调整为27.1%，大体上恢复到1957年比较正常的比例关系上来。

这一次搞高积累，是从1970年开始，积累率超过30%的时间持续有十年之久。同这种高积累相关联的重工业生产规模，也随之步步加大，重工业生产的产值比重上升到55%以上。在重工业内部，加工工业（主要是机械工业）更是畸形发展。从1971年到1979年，重工业新增的产值中，一半以上是加工工业。而这些新办起来的工厂，或者新增加的生产能力，经过十年的时间，也不再像六十年代那种“小土群”好调整了。需要从现实情况出发，采取相应的新对策，对于那些同大工业争原料、争燃料动力、而消耗大、产品质量差的小厂，对于那些产品质量次、消耗高，长期亏损、实在

没有必要的企业，应该继续采取六十年代那次行之有效的办法，坚决实行关停并转；除此之外，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，他们在生产上已经比较像样子了，只是产品是长线，超过了需求，对这类工厂，根据一些地区和行业的经验，可以通过经济联合的途径，把它们同生产短线、缺口产品的工厂组织起来，实行专业化协作，变“大而全”、“小而全”为社会化大生产，充分利用这些工厂的生产能力，转产适销对路的产品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调整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，决不是消极的。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，完全可以把原来的劣势，经过调整，转化为优势，形成新的“良性循环”。

第二，加强采掘工业。从调整我国国民经济来说，加强采掘工业之所以特别重要，一是由于我们是在一个近十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，组织工业生产，只能是以国内循环为主，辅以国际间的交换，互通有无。我们所需要的能源、矿产原料，必需立足于国内。同时，我国的资源储藏量比较丰富，我们也有这个条件。二是我们搞现代化需要引进一批先进技术，引进技术的外汇哪里来？在目前我们的加工制品竞争能力还不够强的情况下，出口矿产资源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里换取外汇的重要途径。

三十年来，我们的采掘工业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发展，1979年采掘工业的生产水平，比1952年增长了13倍。但是同材料工业、加工工业相比，采掘工业生产的发展显然是慢得多了。同一时期内，原材料工业增长了22倍多，加工工业增加了42倍。采掘工业，所以增长得慢，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建设周期长，花费劳动多，加之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价格偏低，因而除了国家投资建设之外，地方和企业很少有积极性花钱搞采掘工业。另一方面，也是主要的一点，只要一搞高积累，一搞“大干快上”，就要挖采掘工业的“潜力”；只采不掘，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，造成严重比例失调；干不下去了，再回过头来“调整”。以五十年代末期煤炭生产的折腾为例，1957年末煤炭的开采能力是

15,000万吨，1958年搞“大跃进”，就硬是采出了27,000万吨煤，1959年进一步挖“潜”，当年产量猛升到36,900万吨，1960年进一步达到39,700万吨。违反客观规律的事总是长不了的。到了1961年，煤炭产量就不得不大下，从近4亿吨的生产水平，降到2亿多吨，接着用了四年的时间才还清了剥离、掘进的欠帐。一上一下，白白浪费了不少的建设时间。

1970年以来这一次高积累，一大半是在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那种对采掘工业的破坏自不必说了。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本应通过调整休养生息，把失调的比例关系改善一下，但受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继续“大干快上”，失调的采掘关系也就继续加重了。据有关部门摸底，眼下在统配矿中，失调的矿井约占生产能力的40%以上。因此，在今后一段时间里，采掘工业不得不再一次调整那失调的采掘、采剥关系。

调整采掘工业，一是要调整采掘工业在整个工业投资中的比例。从总体来看，我们的基本建设总规模必须大大压缩，否则不能调整好消费与积累这个主要比例关系。但是在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时，对采掘工业、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不能一刀切，一定要照顾到采掘工业建设周期长这一特点，尽可能地少减一些，以争取建设时间。二是在组织工业生产中，要千方百计地节约能源，节约原材料，尽量减少对采掘工业的压力，以使采掘工业有可能腾出手来，尽快地把失调的采掘、采剥关系调整好。只有把采掘关系调整好，我们采掘工业生产的脚跟才能站得稳，才能协调地组织生产。采掘工业搞扎实了，我们工业生产的基础才牢靠。

第三，要把我们工作的着眼点，从主要依靠基本建设投资搞速度，转移到扎扎实实地狠抓经济效益上来。长期以来，在我们的工业生产上存在着一种不正常的情况：看速度，挺不错，动不动就是百分之八、九或者十几，但一考察经济效益，劳动效率并不高；生产出来的产品，在品种、质量上，又往往不合乎需要，造成一边脱销，一边积压；产值增长幅度很大，

实际给国家财政上缴的利润又没有相应的增加,甚至还要亏损。我们讲调整,从面上来说,就是要把这种追速度、实惠少的做法调整过来,不再片面地追求那种不切实际的高速度,把精力用在讲求经济效益上来,使我们的工业生产速度虽然不如过去那么高,但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好的,是适销对路的,资金周转是快的,创造出的财富是多的,用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,来保持我国工业生产的持续发展。

近年来,我们在抓经济效果上做了不少工作,是有进步的。但是总的来说,这方面的潜力还是很大的。拿1980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来看,在产品质量方面,列入统计的54项指标中,还有23项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,约占43%;在物资消耗方面,列入统计的59项指标中,有31项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,约占53%;流动资金周转缓慢,仓库超储物资很多;预算内的工业企业,亏损面仍然高达23%左右。这说明我们把工作的着眼点,转移到狠抓经济效果上来,是大有可为的。经济效果上去了,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实打实的发展速度。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,在我国财政收入中,工业上缴的利润和税收约占四分之三左右,所有工业企业,都应该充分认识我们肩负的重担,把工作做好,狠抓经济效果,千方百计降低成本,增加上缴,在消灭财政赤字、实现财政将来平衡这一重大调整工作中,尽到自己的责任。

“量入为出”的原则

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?

执行财政收支平衡、略有结余的方针,就要按照“量入为出”的原则办事。这个“量入为出”的原则,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呢?

《礼记·王制》:“冢宰制国用,必于岁之杪,五谷皆入,然后制国用。……量入以为出。”可见,在我国周朝的时候,“量入为出”就已经做为一个财政原则提出来了。(贾明)

中国财政学会一九八〇年年会 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 在昆明召开

本刊讯:中国财政学会于1980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在昆明市召开了1980年年会和第四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。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财政学会的理事、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经济主管部门、财政经济理论战线、高等财经院校及部分综合大学和新闻、出版单位的代表240人。会议结合调整经济和稳定经济,围绕财政赤字问题开展了理论讨论,并进而探讨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、分配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关系,以及综合平衡、财政职能作用等问题,使大家在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前进了一步,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进展。会议还总结了学会一年来的工作,确定了1981年研究活动的规划,补选了尹文敬、薛超、雷振南、康振农、马大英、李建昌、沙伊托夫、晋静波

等八位同志为中国财政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。

会议开幕时,财政部副部长、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陈如龙同志致开幕词。他说:我们这次会议有两个任务,一个是召开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会,总结一年来的学会工作,制定1981年学会活动计划;一个是交流财政理论讨论成果,对当前重大的财政经济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展讨论。陈如龙同志说:我们在1979年末第三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上,总结了三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,坚持财政研究从经济入